

论《当世界曾是绿色时》中的记忆幽灵与伦理选择

The Specter of Memory and Ethical Choice in *When the World Was Green*

龙 娟 (Long Juan)

内容摘要：《当世界曾是绿色时》是萨姆·谢泼德晚期的代表作之一，记忆的幽灵贯穿于整部剧作。在该剧中，两位无名主人公在有意与无意的记忆机制中回忆着过往创伤，最后通过伦理选择而达成和解，进而治愈创伤。有意记忆的刻意安排凸显出美国政府实施的“有组织的遗忘”策略对美国土著居民集体记忆的操控，而无意记忆的自发呈现则彰显出个体创伤记忆的表征及深层成因，揭示出“事物的隐匿之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仪式在该剧中的匠心独运，不仅有助于体现剧中主人公的伦理意识和伦理选择，而且有助于体现谢泼德就如何应对创伤记忆以及如何建立“伦理共同体”所进行的深刻思考与有益尝试。

关键词：《当世界曾是绿色时》；有意记忆；无意记忆；伦理选择；伦理共同体

作者简介：龙娟，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美国文学和文学批评理论。本文系国家社科重大招标项目“20世纪美国文学思想研究”【项目批号：14ZDB088】和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20世纪美国文学中的环境记忆主题研究”【项目批号：16BWW008】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The Specter of Memory and Ethical Choice in *When the World Was Green*

Abstract: *When the World Was Green* is one of Sam Shepard's representative works in the late period, throughout which the specter of memory is foregrounded. In the play, the two anonymous protagonists recall their traumatic events through voluntary and involuntary memory mechanism and finally reach the reconciliation and the healing of traumas through ethical choices. While the deliberate arrangement of voluntary memory exposes American government's manipulation of Native Americans' collective memory by the strategy of "organized forgetting", the spontaneous manifestation of the impaired involuntary memory highlights the symptoms and causes of trauma, revealing "the invisible part of things". It is noteworthy that the employment of ceremony in the play not only helps to foreground the two protagonists' ethical consciousness and ethical choice, but also

helps to display Shepard's deep concerns over how to deal with traumatic memory and how to build an "ethical community".

Key words: *When the World Was Green*; voluntary memory; involuntary memory; ethical choice; ethical community

Author: Long Juan is Professor of Foreign Studies Colleg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Her research focuses on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criticism (jlong2004@163.com).

萨姆·谢泼德(Sam Shepard, 1943-2017)被誉为“继尤金·奥尼尔、阿瑟·米勒和田纳西·威廉姆斯之后的又一位伟大剧作家”(Wade 1)。其作品曾多次荣获奥比奖、普利策戏剧奖和戛纳电影节棕榈奖。谢泼德的个人品格及其作品大都与记忆紧密相连。谢泼德本人被视为“西部牛仔”的化身,正是他的这种男子汉气概与人们记忆中的美国历史密不可分,表征着美国文化那段浪漫唯美的选择性记忆。其作品也是建立在记忆大厦的基础之上,其家庭剧尤其如此。鉴于国内外学术界对其家庭剧中的记忆主题已经进行了比较充分的研究,本论文将研究对象聚焦于谢泼德的晚期作品《当世界曾是绿色时》(*When the World Was Green*)。相比较而言,国内外学术界对该戏剧的研究刚刚起步,目前尚无相关研究从创伤记忆与伦理维度来解读该作品。值得一提的是,记忆的幽灵贯穿于整部剧作。在该剧中,老人与女记者在有意和无意的回忆机制中,直接或间接地面对创伤¹,最后做出和解的伦理选择。可以说,该剧体现出戏剧家谢泼德就如何应对创伤记忆所做的有益尝试。

文学以艺术的形式阐明伦理规则,表达伦理诉求,正如聂珍钊教授所言,“文学是特定历史阶段伦理观念和道德生活的独特表现形式,文学在本质上是伦理的艺术”(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14)。美国文论家米勒也认为,“伦理与叙事密不可分”(Miller 2)。可以说,伦理意识和伦理规则通过文学表达出来,其效果往往比纯粹的伦理说教要好很多,因此,文学作品中所塑造的典型人物往往具有明确的伦理意识,总是要面对各种伦理困境和伦理选择。以谢泼德的戏剧《当世界曾是绿色时》为例。该剧中的两位无名主人公(老人和女记者)均遭受了严重的创伤,面临着伦理困境和伦理选择。那么,谢泼德在该剧中是如何凸显被操控的有意记忆与伦理选择的关联呢?又是如何通过无意记忆的自发呈现来揭示受创者的伦理困境与伦理选择呢?该如何诉诸于记忆伦理从而构建“伦理共同体”呢?下面

1 作为一个理论术语,“创伤”首先是由美国学者凯西·卡鲁斯(Cathy Caruth)于1996年在她的《沉默的经验:创伤、叙事和历史》一书中提出来的。卡鲁斯认为,“创伤”通常指“那种突如其来、灾难性的事件中出现的压制性经验,而对这些事件的反应通常是延迟的,以幻觉和其他侵入式的现象反复出现且无法控制”(Caruth 11)。在卡鲁斯看来,这种“压制性经验”会深深地刻在受创者的“大脑、身体和心灵上”,受创者所遭受的这种创伤不会随着时间或地点的变化而变化,会在事件发生后的某段时间或长时间里给受创者的心理留下阴影(Caruth 11)。

我们对此进行探讨。

一、被操控的有意记忆与伦理选择：“有组织的遗忘”

美国学者彼得·莱文曾指出，“记忆是形成自我认同的基础”（莱文 9）。记忆之所以如此重要，主要是因为记忆的媒介意义：人们能够借助记忆对其所接触的人以及经历的事进行分类并建立彼此之间的联系，从而巩固了人们对于外部世界以及自我的认知基础，指引着人们的人生道路。记忆最基本的功能就是联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人们通常从过去的记忆中获取启迪或智慧，以便创造出一个更好的未来。然而，不同于普通记忆，创伤记忆往往出现于突然的或灾难性的事件中，因而受创者往往不愿或不能直接面对创伤事件。为了深入了解这种突如其来的或灾难性事件给人带来的创伤，有意记忆就是一种有效途径。

有意记忆是记忆方式之一，它受目标控制或引导，是个体在目标的引导下主动地、有意识地展开回忆。吴晓东指出：“有意的记忆就是作者对故事框架的建构，对人物形象的着意塑造，对情节的有意识的逻辑安排。这种情节性、故事性显然必须依赖于自觉的回忆，依赖有意的记忆，它是无意的记忆无法企及的”（吴晓东 63）。然而，正如丹尼尔·罗宾（Daniel Rubin）（2008）等人所言，创伤记忆的机制不同于传统的记忆机制，它有特殊的加工机制，即特定机制（the special mechanism）。特定机制的假设之一就是“创伤记忆中的有意记忆（voluntary memory）受损，而无意记忆（involuntary memory）增强”（Rubin 591）。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引导受创者的有意记忆就显得尤其重要。谢泼德的戏剧《当世界曾是绿色时》对此进行了一些尝试。

在《当世界曾是绿色时》一剧中，主人公是一个美国土著居民，其记忆因为遭受创伤而受损，因而谢泼德刻意塑造了一个女记者的形象，由该女记者来引导主人公的有意记忆。从一定意义上讲，这种有意记忆凸显出创伤记忆的可操控性。创伤记忆的可操控性有多种原因：有来自受创者自身的原因，也有来自外部的因素。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来自外部的因素从本质来说是一定伦理环境下的“伦理选择”。一个明显的例子是，自从欧洲殖民者来到美洲以来，他们故意蔑视土著居民的传统文化，企图证明土著文化是愚昧和野蛮的，从精神上和心理上瓦解土著居民对自己的历史和文化的认可。这种策略被保罗·康纳顿称作“有组织的遗忘”（Connerton 14）。这种“有组织的遗忘”是一种典型的来自外部操控因素的“伦理选择”，体现出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引导与“规训”。康纳顿指出：“当一个强国想剥夺一个小国的民族意识时，它会用到‘有组织的遗忘’这种方法。”这种事情也会发生在一个国家内部，当这个国家里有权威的力量想移除那些被统治阶级的记忆时，他们也会这么做：“像这种互动的一个极端的例子是，一个国家以一种系统的方式利用某种机构去移除子民的记忆”（Connerton 14）。

当土著居民被来自欧洲的白人奴役和压迫的时候,这种“有组织的遗忘”曾经在美洲大陆真实存在过,使得土著居民深受其害。土著作家已经在其著述中深刻揭示了这种行径。例如,美国土著作家西尔克在其小说《死者年鉴》中曾经公开揭露过:“四百年间,白人一直让土著居民忘记过去”(Silko, *Almanac* 310)。白人企图改写美洲大陆历史和诽谤土著居民,而书籍是传承一个民族历史的重要载体,因此土著居民的书籍成为白人毁灭的重要目标。对此,西尔克在《黄色的女人》一书中曾经一针见血地披露了白人的阴谋:“他们控制了美国,不想让人们知道他们的历史”;白人担心如果“人们知道了自己的历史,他们就会反抗”(Silko, *Yellow Women* 431)。这样一来,“1540年,土著居民的大图书馆被毁掉了,是因为西班牙人害怕这些书里面的政治和精神力量”(Silko, *Yellow Women* 165)。白人憎恨土著居民的书籍中保存的智慧和文化遗产。白人不仅想粉饰土著居民集体记忆中关于那段被压迫的历史,还想根除土著居民文化的根。针对这一点,西尔克解释道:“欧洲人急切地想毁掉一切能够证明土著居民的文化与他们的文化一样优秀的证据;他们甚至与教皇辩论,认为土著居民不是真正的人类,因此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对待这些人和这些土地”(Silko, *Yellow Women* 21)。白人不仅想让土著居民忘记历史,他们还编造了关于土著居民如何低能、如何血腥以及如何贪婪等故事来掩盖历史真相。

对此,不仅西尔克等美国土著作家深刻揭露了这种“有组织的遗忘”策略对美国土著居民的破坏力,难能可贵的是,少数白人作家也逐步认识到了这种“有组织的遗忘”对土著居民造成的恶劣影响。以《当世界曾是绿色时》一剧为例。在该剧中,有意记忆主要表现为女记者有意识和有目的地对老人进行追问,使得老人不得不在女记者的引导下有意识地回忆创伤发生时的细节。在每一幕剧中,对情节起推动作用的是女记者有意识的追问。在女记者与老人的一问一答之中,事件的来龙去脉似乎逐渐明了,而实际上,该剧中的老人就生活在这样一种“有组织的遗忘”当中。这主要体现在他的有意记忆中,其中的一些细节被无限放大,而另外一些细节又被缩小,甚至删除。例如,老人的家族矛盾与追杀卡罗之事在有意记忆中被放大,白人对印第安人的战争与掠夺却在有意记忆中被缩小。老人的有意记忆以自己家族内部关于骡子引起的仇恨为线索展开,这些似乎表明老人和女记者的创伤主要是由美国土著各个部落之间的内部矛盾造成的,是由土著居民的愚昧和狭隘造成的。

而实际上,美国土著居民内部的这些矛盾主要是由于白人的入侵与同化造成的。白人文化与土著文化的关系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冲突。土著居民传统的生活方式意味着他们必须要依靠广阔的土地资源,而随着白人入侵,白人以各种方式侵占土著居民的土地资源,并用以发展工商业,这极大地挤压了土著居民的生存空间,给他们的生存带来了极大的挑战。至此,我们应该不难解答下面的问题:在《当世界曾是绿色时》中,老人家族的骡子为什么会

去吃邻居家的庄稼呢？即使骡子吃了邻居家的庄稼，这件小事为什么会在老人的家族中引起轩然大波呢？主要原因就在于，美国土著居民被困在那狭小的保留地中，其活动范围受到了极大的限制，生存空间被白人不断地侵占，生存环境受到极大破坏；再加上一些土著居民受到了白人统治者的挑拨、甚至收买与利用。可是该剧并没有将重心放在白人对美国土著居民的生存环境所造成的破坏上，而是将重心放在土著居民之间那些无足轻重的矛盾和冲突上，再现了普通白人对土著居民的认知，从而揭示了白人实施的“有组织的遗忘”策略以及同化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操控了美国土著居民的集体记忆。

值得一提的是，谢泼德并没有对该剧中的两位主人公赋予具体姓名，而仅以“老人”和“女记者”予以称呼。另外，戏剧家安排一个受过创伤的女记者对一个受过重大创伤的老人进行追问，其用心良苦。老人在女记者的步步追问之下进行有意记忆，回忆了多年前那场家族纠纷以及他追杀卡罗的过程。记者的职业操守和职业理想本来应该是探求真相，但一个受过创伤的主流媒体记者能够客观地探寻和报道真相吗？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个女记者是政府实施“有组织的遗忘”策略的传声筒和受害者，因此无法引导老人对创伤的根源进行真正的深究。我们以剧中的第一幕为例进行分析。第一幕中的首句话就是女记者的问句——“这一切都是怎么开始的？”（9）¹这个问题激发了老人的有意记忆，使得老人想起了那场家庭冲突。女记者便顺势向老人问起了家庭冲突的时间、地点、起因。老人在女记者的引导下，一步一步地开始回忆起多年前发生的家庭纠葛，揭开了回忆的序幕。在老人追寻并计划毁灭家族所指定的那个人的一生中，他被各种创伤事件所折磨。但是对老人打击最大、影响最深的创伤是他被家族指派去杀死从小一起长大的卡罗，这个命令成为了他一生无法摆脱的身份标志，使他失去自己的梦想，失去了自我。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女记者的提问与引导，老人也只是给予了非常简短而又模糊的回答，不能完整而详尽地回忆起创伤事件的所有细节，这也表明了创伤事件对老人的记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以至于他夜夜饱受创伤记忆的折磨，无法入眠。从这个意义上讲，老人既是一个施害者，又是一个受害者。尽管他在有意识地回避与创伤事件有关的细节，因而无法一次性地回忆起创伤事件的来龙去脉，但是这场有意记忆的刻意安排毕竟揭开了“有组织的遗忘”的神秘面纱，拉开了创伤记忆的序幕。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白人对美国土著的血腥战争以及战争给美国土著所带来的灭顶之灾，都未能在老人的有意记忆中得到凸显，而是反复闪现与不断介入到老人的无意记忆当中。

二、自发呈现的无意记忆与伦理选择：个体“创伤后反应”

在《当世界曾是绿色时》中，如果说被操纵的有意记忆凸显出美国政府

1 本文相关引文均出自 Sam Shepard and C. Shami, *When the World Was Green* (New York: Dramatists Play Service, INC, 2007)。下文只标注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实施的“有组织的遗忘”策略对美国土著居民集体记忆的操控，那么无意记忆的自发呈现彰显出个体“创伤后反应”，揭示了个体创伤记忆的表征及深层成因。无意记忆体现了创伤对受创者的影响之深远，使得受创者无法靠自己的意志摆脱或者忘记过去的创伤。在这种伦理环境下，受创者会采取何种伦理选择呢？达格利什（Dalglish）于2004年提出，无意记忆是受创者应激反应机制之一，其记忆储存保持“激活状态”。当个体处于正常状态下时，会出现两种机制来整合新信息与个体已有的知识与经验，其中一种机制促进新旧信息的整合，另一种机制会抑制新信息的进入，保证个体能很好地适应环境。但是当个体受到创伤时，“整合过程遇到障碍，引发持久的创伤后反应，暂时未被加工的信息可能以闯入、闪回、噩梦等形式进入意识层面，个体出现侵扰现象”（Dalglish 228）。门罗（Monroe）和米内卡（Mineka）（2008）则认为，“压力事件下形成的记忆以有意、无意两种记忆方式重复出现，且有意记忆被削弱。由于创伤认知的新旧信息无法匹配，个体不能回忆全部事件；而无意加工机制增强，产生大量的侵扰性记忆碎片。无意记忆是创伤事件或压力性刺激的特定记忆加工机制”（Monroe 1084）。也就是说，自发呈现的无意记忆再现了创伤事件发生时在受创者脑海中留下的难以弥灭的画卷和难以愈合的个体创伤后遗症。具体说来，无意记忆从以下两个方面凸显出“创伤后反应”（Dalglish 228）。

首先，无意记忆的非逻辑性与无序性凸显个体“创伤后反应”。人们的记忆被偶然激发，它所呈现的并不是一种有逻辑和有次序的状态，而是一片混沌发散的状态。在这部剧中，无意记忆的非逻辑性和无序性主要体现在老人多次毫无来由的内心独白上。实际上，老人毫无来由的内心独白是他遭受严重创伤的表征。这些内心独白与上一幕剧或下一幕剧并没有逻辑上的关联，似乎是一种偶发性的记忆。在老人多次的内心独白中，他回忆了自己过去种种悲痛的、不愿想起的记忆。例如，老人在与女记者谈话的间隙，突然在脑海中浮现出下面这个画面：他曾经跟随着一群士兵到处搜寻村庄的水井，最后在一口水井中发现了一个水桶，人肉浸泡在深红色的血液中。这是老人一段痛苦而又不愿想起的记忆，展示了老人曾经遭受过的种种创伤。又如，老人的脑海中会突然浮现出他曾经生活的村庄被烧毁的痛苦画面，“那些事物总是来回萦绕在我眼前。甚至是在我还没有意识到那些事物时，魔鬼、人脸、我从未听过的声音以及我从未到过的地方，这些东西填满了我，然后又再次离开我”（23）。老人清晰地记得燃烧着的村庄、翻滚的火浪、此起彼伏的尖叫声、炙热的风、村民的面孔以及奔跑着的人，这些画面在他脑海里盘旋，并没有逻辑和顺序可言。这些看似不相关的画面连结成一张巨大的回忆之网，表明老人的创伤记忆如影随形。可以说，老人的无意记忆中反复出现人脸、魔鬼、深红色的血液、燃烧的村庄、四处逃跑的人等挥之不去的血腥场景，这些刻骨铭心的记忆碎片是最真实的存在。这一方面彰显无意记忆的真实性

和有序性，另一方面凸显出创伤的种种表征与深层成因，揭露了白人对美国土著居民所犯下的暴行。

其次，无意记忆的具体性和感官性特征凸显个体“创伤后反应”。无意记忆往往是由记忆之物所唤醒，而记忆之物是具体的和可触的。可以说，事物的意义就保存在个体的具体记忆当中。《当世界曾是绿色时》中有许多有关过去的记忆碎片，它们往往是关于过去某个事件的细节描述。例如，老人年幼时与母亲一起逛菜市场 and 买菜的场景经常闪现在他的脑海中：一车车的蔬菜和水果围绕着他，仿佛置身于森林之中；一条条鱼堆积成山，在太阳下闪闪发光；挂在钩子上的鹿头和猪头随处可见；整个菜市场都充斥着烹饪的味道。这些具体的事物出现在老人的头脑之中，使得他仿佛又再次回到了小时候，回到了那个菜市场。可见，那些具体的蔬菜、水果、鱼、鹿头和猪头长久地存在于老人的脑海之中，提醒着他当初想做厨师的热情和理想。这种热情和理想是抽象的，不可描述的，但是由于记忆的具体性和感官性，老人每次回忆这些情景都仿佛身临其境，都能再次体会到当初的感觉。又如，当女记者问起老人无法入眠的原因时，老人回忆起那些萦绕在他脑海里具体的画面，比如：“鸟、面孔、逃跑的人群、风、开阔的海洋”（14）等。这些画面都来自于老人遭受过的创伤记忆的碎片，将老人再次引入现场。这种经历并不是与当下脱节的，而是时时刻刻折磨着当下的老人，是他受创的表征。正是记忆的具体性和感官性特征使得老人不得不直面他的创伤记忆。无疑，“人对客观事物的直接把握就是感觉。感觉也是人的感觉器官对外部世界或内部世界的数据采集，因此感觉也是人了解外部世界或内部世界的原始数据，是人的心理活动的基础和前提。感觉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直觉，它不受理性控制，也不经过逻辑的推理，而是人体感觉器官对相关客观对象的直接反映。”（聂珍钊，“论人的认知与意识”91-92）。事实上，“认知从感觉开始，到意识结束，构成认知的一个过程”（聂珍钊，“论人的认知与意识”94）。

正是因为无意记忆具有这种具体性和感官性特征，创伤性事件可能会以不断重复的或侵入性的记忆片段被再次体验。这些过程都伴随着主人公的无意记忆，回忆者被动地回到过去的情景之中，直接地面对自己内心深处的创伤。例如，当老人回忆关于被害者生前喝咖啡这个片段时，老人详细地描绘了被害者的一举一动。这种片断式的场景充斥着许多细节，而且这些细节跟其他细节形成断裂，具有明显的具体性和感官性特点。又如，土著部落的文化与传统在老人的无意记忆中也是以片断形式反复出现。在该剧中，当人与人之间没有仇恨，当世界还是绿色时，老人关于土地的回忆都是童年时的美好记忆：“那儿的空气很清新，土壤很肥沃，那儿种植了最可口的水果和坚果”（13）。老人的记忆中满满都是曾经的清风、曾经的绿树、曾经肥沃的土壤以及他们家族的骡子。这些具体的画面都时刻提醒着他：那片绿色的土地曾经属于他们部落。然而，随着白人的入侵，印第安人渐渐失去了那片绿色的

土地，那个世界不再是绿色，部落之间开始产生纠纷，人与人之间也充满了仇恨和杀戮。可见，《当世界曾是绿色时》中那片绿色的土地只存在于老人的无意记忆之中，失去了那片绿色的土地对于老人来说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总之，一幅幅具体或断片的画面反复出现在老人的头脑中，这种个体创伤后遗症凸显出老人受创的种种表征与深层成因。

可见，通过对无意记忆所凸显的个体创伤后遗症进行书写，谢泼德深刻地揭示了创伤的表征及深层成因。谢泼德曾经在论及作家的创作动机时坦言，他希望在戏剧中找寻“事物的隐匿之处”（Bercovitch 61）。那么，《当世界曾是绿色时》中的“事物的隐匿之处”或者说真相在哪里呢？或许，“隐匿之处”就藏在无意记忆当中。在自发呈现的无意记忆当中，“记忆成为当前的现实，被压抑的情感得以显现”（Bercovitch 61）。

三、记忆伦理与伦理选择：“伦理共同体”的建立

“人同兽相比最本质的特征是具有伦理意识，只有当人的伦理意识出现之后，才能成为真正的人”（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伦理选择与斯芬克斯因子》6）。无疑，只有当人具有伦理意识时，人才能够称得上是真正的人，才有理性意志去面对生活中的各种困境，从而做出伦理选择。普通人在面对困境时需要做出伦理选择，当代社会中那些遭受种种创伤的人们更是如此。被创伤记忆缠身的人们该如何做出伦理选择？在这个问题上，美国作家有着自己的判断，正如美国学者阿提利奥·法沃里尼（Attilio Favorini）所言，美国作家“通常将美国历史视为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努力直面创伤，重建意识来治愈自己的伤痛”（Favorini 221）。在美国作家看来，在一个创伤化的社会中，文学是重建意识的重要方式，因为作家能够通过书写创伤，揭示创伤的深层成因，进而提供诸多伦理思考与更新生命的空间，从而有效地治疗创伤。例如，当代美国戏剧家谢泼德在其作品《当世界曾是绿色时》就如何处理创伤记忆以及如何做出伦理选择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思考，提出了独特的方案和伦理诉求。

在该剧中，主人公曾经饱受创伤记忆之苦，最后意识到唯有遵守“最基本的伦理规则”（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14）以及做出伦理选择，才能真正疗愈创伤。实际上，主人公在努力直面创伤，重建意识来治愈伤痛的过程也是提升伦理意识和做出伦理选择的过程。毕竟，“人是一个斯芬克斯因子的存在，……在认知过程中，人同其它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能够不断地用人性因子抑制和引导兽性因子，始终让人性因子处于主导地位，不断地通过伦理选择学习做人。做人是认知的目的，也是认知的驱动力”（聂珍钊，“论人的认知与意识”94）。

同样，在记忆领域也存在记忆伦理，需要人们提升伦理意识去遵循一些伦理规则，正如美国犹太哲学家阿维夏伊·玛格利特在其《记忆伦理》（Avishai

Margalit) 一书中所论述的那样。可以说,《当世界曾是绿色时》中的主人公最终自愿选择宽恕,这种伦理选择彰显出记忆伦理意识与伦理诉求,体现出重要的伦理意义,有助于建立“伦理共同体”¹(ethical community)(Margalit 182),并有助于疗治创伤。一般而言,宽恕意味着克服愤怒和仇恨,意味着忘记仇恨。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如果只是简单的忘记,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宽恕。宽恕是一种有意识的决定行为,因此可以改变人的态度,真正克服愤怒和仇恨……但在回忆的情形下,作为自主决定的宽恕,称得上是一种间接的方法,它能够产生忘记的效果,从而完成宽恕的过程”(Margalit 193)。

正因为“‘宽恕’一词既包含过程,也包含成就,正如工作一词既包含过程也包含成就一样”(Margalit 205),所以,真正的宽恕需要某种仪式来凸显和见证这个过程,从而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伦理共同体”。需要强调的是,该剧中的仪式都与女性相关。或者说,女性是治愈剧中主人公创伤的关键因素。在美国土著文化中,女性的力量举足轻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女性与自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人们在想象“生态印第安”的时候有两大显著的趋势:一个趋势是“自然的女性化”;另一个趋势是“女性的自然化”。该剧中有多处提到女性的重要性,强调只有女人才能结束持续上百年的纷争:“所有女人要做的就是从头上取下头巾,然后在风中挥舞,接着所有的流血之争都会停止”(9)。女记者的外祖母也拥有这种来自自然的神秘力量:她能从中得知女记者失散多年的父亲会何时出现在何地;女记者也能治愈老人的创伤并与他达成和解。这些都说明了女性所拥有的神秘力量。女性代表着重生,她能让所有罪恶都停止,给予生命新的机会。换言之,女性就是给予生命的人:“在这种思想体系中,人和人之间,人和自我之间,人和自然之间才能保持着平衡且亲密的关系”(Winona 132)。但是西方殖民者的入侵打破了这种平衡,破坏了这片绿色的土地,给本土居民造成了无法言说的创伤。

在《当世界曾是绿色时》中,女性是治愈主人公创伤的关键人物,因此仪式由女性来主导至关重要。不仅如此,以何种方式实现宽恕与遗忘对治愈创伤也极其重要,因为这个重要仪式涉及到如何在实践层面上直面创伤并疗愈。具体地说,剧中的老人决定为女记者做一顿饭的过程就是他选择宽恕与

1 作为一个理论术语,“伦理共同体”出现在美国犹太哲学家阿维夏伊·玛格利特于2002年出版的《记忆伦理》(Avishai Margalit, *The Ethics of Memory*)一书中,但是玛格利特并没有专门对该术语进行界定。不过,我们从玛格利特的相关论述中可以看出,“伦理共同体”主要涉及到共同拥有某些或所有相关人和事的记忆主体,这些记忆主体之间总是处于一定的伦理关系之中,形成一种具有“浓厚”关系的共同体。可以说,该术语是在前人对“共同体”这个术语的论述基础上在记忆伦理方面的拓展与突破。在社会思想史上,首次对“共同体”进行专门探讨的是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威廉斯后来在其《关键词》一书中专门对“共同体”这个关键词进行了梳理,认为其英文词最早可追溯至拉丁文“communis”,意为“普遍”、“共同”,即由某种共同的纽带联结起来的生活有机体(参见威廉斯,第79页)。

遗忘的表征，完成这个过程就是完成了一种神圣的仪式。当老人为女记者做饭时，老人找到了一种目标感和身份认同感。另外，他暂时充当了女记者那未曾谋面的父亲的位置。当再现他往日做饭的场景时，老人的身份不再是卡罗的追杀者，第一次获得了独立于卡罗的身份，成为独立的自己。正是在女记者的坚持之下，老人才答应为她做一顿饭。“一般而言，宽恕者决定做出自愿宽恕的这个过程，其最终结果是忘记了伤害，修复了其与冒犯者之间的关系，仿佛伤害从未发生过一样”（Margalit 205）。在剧中，当老人重现他厨艺的过程时，他与女记者充分交流，这让两个人获得了内心的平静。老人也在自己的厨艺之中找到了自我，成为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独立而自由的个体，不再为家族恩怨所纠缠。至此，老人和女记者以这种伦理选择的方式化解了恩怨，走出创伤记忆和伦理困境，重回那个绿色的世界。

可以说，谢泼德的创伤记忆书写不仅有助于抚慰受伤的心灵，“使之在书写中被修复”（Dawes 408），而且也有助于谢泼德以独特的方式表达自己对如何做出伦理选择以及如何建立“伦理共同体”等问题的关注与思考，其现实关怀旨趣不容忽视。具体地说，谢泼德在《当世界曾是绿色时》中构建了一个基于伦理选择基础上的非乌托邦式现实生存空间。这个生存空间是一个旨在实现“三个方面的统一”的“伦理共同体”。这个“伦理共同体”肯定了真正的伦理诉求和伦理实践的存在，从而有望实现“人与自身的统一、人与人的统一以及人与自然的统一”（Margalit 152）。或许，该剧的标题“当世界曾是绿色时”就蕴含了作家的这种美好希冀。这也给读者留下了众多启迪，因为“阅读行为中必然存在一个伦理的时刻，这个时刻既不属于认知的或政治的，也不属于社会的或人际关系的时刻，而是真正属于独立的伦理时刻”（Miller 1）。这个“独立的伦理时刻”包含两个维度，一是指读者对作品中所蕴含的伦理观的理解与认可；二是指读者将作品中所蕴含的伦理思想内化为自己的伦理观与伦理诉求，并准备在以后的社会实践中不断践行与检验（Miller 4）。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世界曾是绿色时》这部剧中所蕴含的伦理意识和伦理选择或许对解决人与自身、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各种伦理困境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与价值。

Works Cited

- Bercovitch, Sacvan,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vol 7. Cambridge, New York: Harvard University, 2007.
- Caruth, Cathy. *Unclaimed Experience: Trauma, Narrative, and History*.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P, 1996.
- Connerton, Paul. *How Societies Remember*. Cambridge: Cambridge UP, 1989.
- Dalgleish, Tim. "Cognitive Approaches to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The Evolution of Multirepresentational Theorizing."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0.2 (2004): 228–260.
- Dawes, James. "Human Rights in Literary Studies." *Human Rights Quarterly* 31.2 (2009): 394–409.

- Favorini, A. *Memory in Play from Aeschylus to Sam Shepard*. New York: Martin's Press LLC, 2008.
- Laduke, Winona. *All Our Relations: Native Struggles for Land and Life*. Cambridge, Mass: South End Press, 1994.
- 彼得·莱文:《创伤与记忆》,曾雯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年。
- [Levine, Peter A. *Trauma and Memory*. Trans. Zeng Wen. Beijing: China Machine Press, 2017]
- Margalit, Avishai. *The Ethics of Memor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London, England: Harvard UP, 2002.
- Miller, Hillis. *The Ethics of Reading*. New York: Columbia UP, 1987.
- Monroe, Scott & S. Mineka. "Placing the Mnemonic Model in Context: Diagnostic, Theoretical, and Clinical Considerations." *Psychological Review* 115. 4 (2008): 1084–1098.
-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 [Nie Zhenzhao. *Introduction t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eijing: Peking UP, 2014.]
- . “文学伦理学批评: 基本理论与术语”,《外国文学研究》1 (2010): 12-22。
- [—,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Its Fundamentals and Terms."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1(2010): 12-22.]
- . “文学伦理学批评: 伦理选择与斯芬克斯因子”,《外国文学研究》6 (2011): 1-13。
- [—,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Ethical Choice and Sphinx Factor."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6 (2011): 1-13.]
- . “论人的认知与意识”,《浙江社会科学》10 (2020): 91-100。
- [—, "On Human Cognition and Consciousness." *Zhejiang Social Science* 10 (2020): 91-100.]
- Rubin, David, Adriel Boals & Dorthe Berntsen. "Memory in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roperties of Voluntary and Involuntary, Traumatic and Non-traumatic Autobiographical Memories in People with and Without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Symptom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137. 4 (2008): 591–614.
- Shepard, Sam and C. Shami. *When the World Was Green*. New York: Dramatists Play Service, INC, 2007.
- Silko, Leslie Marmon. *Almanac of the Dead*.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91.
- . *Yellow Women and a Beauty of the Spirit: Essays on Native American Life Toda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6.
- Wade, L. A. *Sam Shepard and the American Theatre*. London: Greenwood Press, 1997.
- 威廉斯:《关键词》。刘建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
- [Williams, Raymond. *Key Words*. Liu Jianji, trans.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 吴晓东:《从卡夫卡到昆德拉: 20 世纪的小说和小说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
- [Wu Xiaodong. *From Franz Kafka to Milan Kundera: 20th Century Novels and Novelists*.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17.]